

试论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彭升, 林猷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由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推动的韩国政治转型, 其在政治变革前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说明, 应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 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 健康、平稳地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 韩国; 政治转型; 市民社会; 中国民主政治

中图分类号: D5;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099-04

韩国的政治转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引人注目, 其在政治变迁中面临的二元国内政治环境与当代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所面对的社会背景较为相似, 在韩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市民社会的成熟等因素推动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 这些都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市民社会兴起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一) 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大韩民国建国初期, 拥有美国教育背景, 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试图在韩国推行美式民主。但是由于朝鲜半岛以往是受君王专制统治, 行政权力凌驾于其它权力的痕迹明显, 建国之初的韩国延续了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惯性, 因而美式的宪政体制在韩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也并没有遏制住行政权力的过分扩张。原本期望的民主政治模式蜕变为威权政治模式。其后上台的朴正熙、全斗焕的军人政府也继续维持着威权统治的模式。这一模式在韩国经济文化精英缺失, 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下, 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 尽管威权政治模式创造了“汉江奇迹”, 在经济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 但在衡量政府合法性的另一维度——政治自由方面, 威权政府却绩效不佳。随着经济的腾飞, 人们逐渐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 争取民主的呼声日益壮大, 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以及人

们逐渐高涨的政治自由、政治民主要求, 韩国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具雏形, 业已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韩国社会, 出现了颇具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 这为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中产阶级向威权政府提出了扩大政治参与的民主化诉求, 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与此同时, 部分中产阶级作为现存秩序的受益者, 又主张将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规模内, 不赞成暴力斗争。作为市民社会的主导力量, 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使韩国的政治转型更趋向于以平稳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政治诉求方式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 同时也使得民选政府的政权合法性基石得以巩固。当政府与民众之间出现矛盾时, 不再是以往的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 而是用和平的制度化方式来谋求政治上的共识。总而言之, 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政治阶层的兴起, 在一方面促进韩国人民政治启蒙的同时, 另一方面通过斗争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 争取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及普通民众的支持, 为日后本阶级登上韩国政治舞台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及合法性基础。

(二)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

政治精英的历史推动作用与市民社会争取民主的运动是相辅相成的。在大韩民国成立初期, 由于经济的不发达和教育资源的匮乏, 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相对缺少, 这使得政治精英由于面临的政治权力竞争不那么激烈, 而容易形成由单一政治精英主导的威权政治。但是,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教育水平的提高, 韩国的市民社会逐渐兴起, 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 他们与具有民主理念的政治精英

收稿日期: 2012-12-26; 修回日期: 2013-06-14

作者简介: 彭升(1964-), 男, 湖南汨罗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林猷(1990-), 男, 福建福安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良性互动,促进了这三种力量结成同盟,共同争取民主。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精英当属韩国的三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以及金大中。面对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及威权政治体制的内忧外患,卢泰愚发表的民主化宣言所阐述的原则经全民投票被写入了宪法。之前,韩国的宪法也几经修改,但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威权统治的需要,唯有此次修宪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卢泰愚恰逢其时的民主化宣言也使其在稍后的总统全民直选中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泰愚政府在促进韩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仍不可避免地被视作是军人政权的延续。作为第一位经全民选举产生的文人总统,金泳三在参加民主化运动时曾受到过威权政府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上台后的金泳三除积极培育市民社会,进一步巩固市民社会在韩国政治中的地位外,还在处理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军队保持中立,防止军人干政,此举为韩国的文官政府稳定而持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维护宪政权威,金泳三对前军人政府首脑全斗焕、卢泰愚进行了“世纪审判”,藉此向韩国民众表明了其建立廉洁政府的决心。对于政党之间的竞争,金泳三则采取开放的姿态,加强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运作,并促使政党间良性竞争的开展。另一位民主化运动的领袖金大中是韩国第一位在野党候选人成为总统的,他与金泳三在反抗威权政府的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因而也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政治民主的转型。为整合国家力量恢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的韩国经济,金大中在青瓦台宴请前总统崔圭夏、全斗焕、卢泰愚,此举消除了韩国政党之间多年的隔阂,加强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系。同时,金大中还创建了新党,从而使韩国政党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政治精英的出现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为表达中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而不懈努力。其上台后的政治实践使得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三) 民众基督教斗争精神的弘扬

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63)}。而作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自然对韩国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韩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注重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强调维护现有秩序,这就无法为民众反抗政府威权统治提供思想武器。儒家文化以“和”

的思想为主导,不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而基督教在韩国的迅猛发展恰恰为韩国民众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在威权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教会主动承担起了维护人权,争取民主的使命,连原先政治立场趋于保守的天主教也加入了这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民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金泳三、金大中本身就是基督教教徒,基督教的平等、民主思想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们毕生也是为实现韩国国民能够更好地参与政治而奋斗。同时,因为基督教的组织性质并不是单纯的国家内部组织,而是跨国的、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时不得不投鼠忌器,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国际性的纷争,从而基督教的教会活动就为民主人士的民主斗争提供了最好的隐蔽。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有过这样的论述:“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2](116)}基督教在韩国政治转型中主要起着凝聚人心的作用,政治精英们接受了基督教中进步的思想,从而使用这些思想对韩国民众进行教育,以起到政治启蒙的目的,从而为推动韩国民主进程争取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

二、政治环境结构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政治环境结构对政治转型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政治环境结构作为政治转型的环境因素,影响着政治转型的进度。

(一) 二元的国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二元的国际环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先进—落后”的二元国际经济环境;政治上则表现为“民主—威权”的二元国际政治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开始了经济复苏进程,许多国家的经济都纷纷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韩国的经济却止步不前,这与李承晚执政时期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先统一,后建设”不无关系。但是,经济落后产生的巨大的国际环境生存压力迫使之后上台的朴正熙政权改变了政策目标,启动了韩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后发展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必然具有追赶性、急剧性、全面性的特点,而发展前期的追赶性、急剧性特点要求后发展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以便能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合力,成功地启动和推进经济发展进程,这就为韩国威权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往往是直接借鉴和迁移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技术以便形成更多的现代

性因素而缩短现代化进程,因而西方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涌入对韩国国民传统的观念造成了冲击。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必然也会政治上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两个因素为之后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员和社会力量支持。而全面性特点则要求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是全面的,即不仅仅只追求经济的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全面示范效应迫使后发展国家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革,也是由于后发展国家国民对现代化进程具有较高的期望值。韩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要求一直遭到威权政府的抵制,它们认为唯有威权政治才能实现政治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席卷欧洲、拉美、东亚、非洲等地,韩国的政治精英和要求在政治上提升自身地位的中产阶级大受鼓舞,此时的威权政治在民主政治浪潮的冲击之下已岌岌可危。综上所述,韩国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凭借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提出本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

(二) 二元的国内环境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韩国国内环境的二元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韩国国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这是由威权政治的运行机制决定的。在韩国建国之初,通过各种措施,政府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同时,继承了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庞大统治机器的韩国政府,也掌握了国内的绝对话语权。冷战期间韩国军队的快速发展更是为军人政权的威权统治埋下了伏笔。以上三种因素使得韩国的“强国家—弱社会”模式更加得到了强化。在韩国启动现代化进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之后,这种模式受到了正在崛起的新兴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挑战。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试图扩大社会在政治决策上的话语权,这就与威权政府所要维持的政府权威产生了冲突,社会与威权政府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在所难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二元关系则主要体现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与滞后的政治改革之间的矛盾。凭借着出色的经济绩效,威权政府在执政前期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是,经济的发展也使人们对政治参与的期望值提高,威权政府却试图忽视这种政治利益诉求以保持政权的稳定性,背离民主化政治道路的威权政府因此逐渐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进而又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无形中受到了影响,因而其要求变革现

有政治模式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崛起的中产阶级力量主要集中在社会当中,通过其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走向,从而逐渐使市民社会的力量强于国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情况。

三、韩国政治转型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韩国,其政治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对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经验,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应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 加强市民社会建设

市民社会的崛起在韩国的政治转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有利于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基础。中国与韩国的国内环境同样是二元结构的,即“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形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军事斗争的胜利获得政权,并且为了巩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政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必需。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主体多元,这些利益主体拥有着自己的经济利益需求和政治利益诉求,因而其必然要求在政策制定上拥有话语权以促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出台。这些利益主体的要求实质上是正在形成的市民社会需求的反映。政府对于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应抱有正确的心态,不应该采取敌视甚至是压制的态度,而应该以主动的心态积极培育市民社会以加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成熟的市民社会是由一个个成熟公民所组成的,而成熟公民的标志便是是否具有主体意识。中国经过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破坏,公民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得到树立,缺乏主体意识的公民会削弱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关键在于教育。政府应通过教育机构开展启蒙教育,向公民宣传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理念,培养公民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意识,从而促成公民主体意识的生成。

(二) 重塑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韩国的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体现在原有的政治价值与从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政治价值并存。韩国政治文化系统的二元性并没有导致韩国政治运行的紊乱,在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下,韩国的政治文化主流

仍保持着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但与以往相比加入了更多现代的、民主的元素以适应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也呈现出二元结构,即数千年来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二元结构。而这两种政治价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面临着政治信仰危机,即原有的政治价值文化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生存价值不大,甚至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而新生成的政治价值文化由于旧有政治价值文化的抵制和人们的思维惯性,一时难以被人们接受,因而在政治信仰地带就出现空白现象。为缓解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必须重塑一种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此,必须做到:首先,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成果以指导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其次,对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进行扬弃,传统的政治价值文化并不是一无是处,再加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以及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使得人们一时间难以接受新的政治信仰。为此,寻找传统政治价值文化与现有政治价值文化的共通之处,以人们可以接受的形式向人们进行宣传教育,促进人们政治信仰的形成与政治文化系统的和谐。最后,政治文化的形成应适应时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因此政治文化中民主已经成为必需的因素。而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须有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保证,通过制度的建立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从而辐射到整个政治文化系统,形成民主的政治氛围。

(三) 改善经济政治二元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自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良好态势。但是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迅猛势头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步伐却稍显滞后,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进行政治改革迫在眉睫。而这场政治改革的方式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渐进式的改革。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与中国现存的“强国一弱社会”的政治模式有关,正在形成中的市民社会由于其力量薄弱,导致其不可能担负起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任,因而政府就当仁不让地接过了政治改革的使命。而政治改革应主要从两个层面着手:一是文化层,二是制度层。在文化层方面,一个运行协调的政治文化系统是必备的,但是对于拥有公权力的行政人员的思想以及良好的行政人格的塑造是十分迫切的。只有权力的行使者树立“权为民所赋,必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服务观,才能更好地避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改革的软件层面的改造才算基本完成。制度层方面的改造属于政治系统硬件层面的改革。在制度层方面,政府应建立更多民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更完善的利益表达制度,如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等,改变以往公民的政治利益诉求被“无视化”或“静音化”的政府的不作为现象。

参考文献:

- [1] 李相沃. 韩国的政治文化[J]. 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2] 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Thought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Korea on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ENG Sheng, LIN Ji

(Marx's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mature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elite to promot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South Korea in the political change faced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which China has some similarities. The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 Korea illustrate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remold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mprove the economy-politics dualistic structure and develop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a healthy and steady way.

Key Words: South Korea; political transition; civil society;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s

[编辑: 颜关明]